

情系寨乡 泽被后世

——李惠贞捐赠西南少数民族背扇精品

■ 王伟

去年8月至9月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情系寨乡——李惠贞捐赠西南少数民族背扇精品展”,涉及贵州、云南、湖南和广西4个省份以及苗、侗、布衣等8个少数民族,作品年代也从晚清跨越到上世纪80年代,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西南少数民族背扇艺术的卓越成就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此次展览的成功举办,首先得益于香港李惠贞女士的慷慨捐赠。李惠贞是香港百老汇慈善基金董事长、福慧教育基金会副主席,长期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早在2012年,经由香港中文大学李美贤教授介绍,李惠贞及其所在的福慧教育基金会决定斥资购回流散在美国的近5000件西南少数民族背扇作品。后经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长杨源推荐,李惠贞将其中的1770件背扇精品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此次捐赠获批成为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设立的“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同时,中国美术馆也为此策划了本次展览,以表彰和弘扬其高尚品格与善行义举。

背扇,也叫“背儿带”,是西南少数民族妇女背婴儿用的生活必需品。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几乎无一不是在母亲温暖的背上、在舒适华美的背扇中成长。背扇常以织、绣、染、镶等极为精细复杂的工艺制成,图案古朴、色彩斑斓、造型独特,不仅彰显了母爱的光辉和妇女们高超的技艺,也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习俗,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集中展示的典范。此次捐赠的背扇尤以贵州织金、纳雍和黔西等地的苗族背扇数量最多,造型最丰富。尽管其数量惊人,乍看有相似之嫌,然而仔细观之却发现绝无重复之作。在同一母题之下,不同的作者能通过颜色的对比、图案的差异、面积的大小、针法的不同和材料的选择等创作出千变万化的作品。然而,不论作品在视觉呈现上有多大的差异,同一民族及其分支总是在历史与文化内涵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如贵州纳雍苗族背扇上重复的蝴蝶纹,广西三江侗族背扇上不断出现的太阳纹,以及贵州毕节苗族背扇上比比皆是的城池纹等,都是本民族起源、迁徙和信仰的记忆与记录。这大概是民间、民俗艺术超越其审美性,而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在新时期大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动因之一。

从图案造型的角度,结合文化历史与信仰习俗,可以将这批背扇作品粗略分为4种类别,即生命绵延、远古记忆、自然礼赞和文化融合。

生殖繁衍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也是体现深刻内涵的文化行为。以苗、侗为代表的背扇作品分别以本民族崇信的鱼、桐子花、石榴与榕树花、混沌花、蜘蛛等,暗喻阴阳相交,枝繁叶茂,子嗣绵延。同时,又附加了诸如香囊、流苏、亮片等饰物,同样是为了避邪护生。所以,背扇不仅呵护孩童,也集中反映了这一族群的生命意识。

西南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对本民族历史的



花蝶纹背扇(贵州纳雍,苗族平绣)



花草纹背扇(贵州织金,苗族绞绣)

记忆主要来自心口相传的故事传说、诗歌以及服饰纹样为代表的象形图案,所谓“穿在身上的史书”。《苗族古歌》在描述本族祖先诞生时说:枫树生出蝴蝶,蝴蝶与水泡恋爱而产出12个蛋,后由鹁鸟孵化出姜央(人),雷公、龙、牛、鸡等12兄弟,被尊为苗族祖神。苗族背扇上不断重复出现的蝴蝶与龙凤等纹饰,即是对这段充满神话色彩历史的记录。苗族的历史既是一个与中原王朝冲突不断的历史,也是一段辗转迁徙的历史,那些被称为“弥埋”和“浪务”的抽象纹饰即表示苗族跨越高山大河而一路南迁的历程。这些沉重的记忆被抽象化后定格在背扇之上,借此熏陶后代,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

对自然物的崇信习俗普遍存在于我国各民族与地区之中,其中尤为以苗族为代表的西南各少数民族最为突出。这既与其“万物有灵”的信仰有关,也与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关系密切。世居崇山峻岭之中的苗、侗、水、瑶诸家弟兄,与日月山川为依,和花鸟草虫为伴,形成了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与习俗。反映在背扇上,即是不胜其多、不厌其繁的花草、田地、日月星辰等纹样,然而在表现手法上却因族群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些风格各异的背扇与各民族生活环境和谱统一,相互辉映,构成了西南少数民族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但都似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不大。中原与西南地区真正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始于明代中后期,至清雍正朝达到鼎盛。此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开始传播至苗寨侗乡,背扇上大量出现的诸如“二龙戏珠”“盘长”和“福禄寿喜”等纹饰,即是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交流变得更为频繁和全面,背扇上甚至出现了五角星的图案。此外,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如常展开。如苗、侗在同一地理环境下形成了近似的生产方式与习俗,也使背扇显示出相似而又多元的风格特点。

本次捐赠是迄今为止中国美术馆所接受的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艺术品捐赠。中国美术馆自成立之初即重视传统艺术与少数民族艺术作品的收藏与研究,多年来已经累积珍藏了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艺术作品,其中,西南地区的民间民俗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精品多。仅背扇一项,自2004年以来就两次接受贵州马正荣先生关于西南少数民族背扇艺术精品捐赠共计300余件。此次香港李惠贞女士捐赠的这批作品,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国家艺术品宝库,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品的收藏,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正在遭受工业化时代冲击而日渐式微的时候,中国美术馆却在持续的甄别与收藏之下逐渐构建起庞大的背扇艺术基因库。这批背扇作品的人藏,彰显了中国美术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必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激励更多民众为国家艺术品收藏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员)

容庚:聚实不易,散则何难?

■ 奕品

每一所公立博物馆收藏体系的构建,均离不开私人藏家的无私奉献。日前广州艺博院主办的“容庚捐赠书画特展”就力图全面呈现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收藏家——容庚。

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希白,初号容斋,后改颂斋,广东东莞人。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物鉴藏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曾为故宫博物院古物研究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

容庚的文物收藏以青铜器和书画为大宗。1956年,他为支持博物馆建设首次向国家捐赠文物。到了晚年,他更将毕生珍藏之青铜器、中国画、书法(包括碑帖)、名人信札、图书等悉数捐献其国家。目前受惠于此的机构有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中山大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博物馆等。

据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陈伟安介绍,广州艺术博物院至今所积累的上万件历代书画藏品之中,近1/10为容庚先生所捐赠。这些捐赠品中包含了多件镇院之宝,例如南宋的《云山图》、元代黄公望的《溪山图》、明代戴进的《山高水长图》和明代林良的《秋树聚禽图》等等。“作为接受容庚先生书画藏品最多的机构,我们此次策划的‘容庚捐赠书画特展’旨在通过展览和出版梳理出容庚先生书画鉴藏的脉络。我们以容庚先生所著《颂斋书画小记》为线索,从1000多件(套)捐赠品中精选出500多件(实物)精品,并结合其他相关的文物和手稿,分两期(绘画专题和书法专题)展示,力图全面地呈现一位鉴藏家艰辛搜寻、保护、研究文物之历程。容庚先生捐赠藏品时说:‘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我们当以此言为勉,用展览推进相关工作。”

容庚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容鹤龄和外祖父邓容镜、二舅邓沛霖、表兄邓懋勋均雅好收藏,四舅邓尔雅、族叔容祖椿在艺术上有极高造诣。在他们的熏陶和指



云山图 南宋 佚名

导下,容庚自幼喜好金石书画,并掌握一定的书画技能和鉴赏知识。赴北京之后,有幸得罗振玉、王国维、马衡等名师指导,使其文史素养、艺术见识、鉴赏水平都大为提升,乃至获聘为故宫古物研究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得以饱览内府收藏的文物精品,如鱼得水,获益良多。

1937年,容庚开始购藏书画。由于在财力上不能与商贾豪富相比,挑选藏品时便另辟蹊径。他曾言:“人方以大家为贵,余乃取其冷僻者;人方以有名题跋为贵,余乃取其无题跋者;人方以纸本为贵,余乃取其绢本者;人方以立轴为贵,余乃取其卷册者,闲又估人以为伪作,而余独审其真,辄以精鉴自喜……”在收藏的同时,容庚也开展对历代书画家作品的研究,搜集相关文献史料,辨别书画真伪,梳理源流脉络,渐成收藏体系。在收藏趣味

上,他“喜收文人之作”,看重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书画作品,对文雅的艺术风格亦有偏好,这些都是容庚书画收藏的主要特点。

容庚也喜收“乡人之作”,一直致力于对明清以来岭南地区书画家(包括寓居岭南的书画家)作品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搜罗工作,且独具慧眼,所藏大多为名家精品,并结合收藏,开展岭南地域书画研究工作。如网罗张穆作品,进而搜集张穆相关资料,撰写了《张穆传》。又如得到林良《秋树聚禽图》后,搜集其相关资料,考证其生卒年,著《林良评传》。在其所著的《颂斋书画小记》中,记下了很多经他搜集得到的岭南书画家生平活动史料,尤其是对一些声名并不显赫但极具研究价值的书画家如容祖椿等的记载,为后人研究岭南书画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信息。除了在

书画作品上留下题跋之外,容庚还为一些广东籍收藏家、书画家的著作作跋,内容涉及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如为南海籍收藏家叶梦龙所著的《风满楼书画录》作跋,选编东莞籍书法篆刻家邓尔雅诗成《绿绮园诗集》并为之作跋,还撰有《东莞印人传》一文,对东莞籍篆刻家进行了综合性梳理,均收录于其所著《颂斋述林》中,成为岭南书画研究的重要资料。此外,容庚的收藏视野不限于历代名家和乡邦文物,对于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和优秀书画家之作也甚为关注,在其收藏中,这类作品为数不少。

容庚自言,平生收藏书画有1300多件(套),过眼有500余种。其收藏的渠道,在广州艺博院陈列研究部主任陈志云看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其一,购买。这是容庚书画收藏的主要渠道。从1937年开始购藏第一幅古画吴历《湖山春晓图》后,他的书画购藏活动便一发而不可收。其中,从1939年至1949年,以及从上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是其购藏书画最多的两个时期。其二,得自祖传。其祖父容鹤龄掌教东莞龙溪书院数十年,雅好书画,也写得一手好字。其父容作恭早卒,家道渐中落,祖传书画能遗留给容庚的已然不多,其中就有一轴王冕的《仿李晞古山水图轴》。其三,与亲友交换所得。容庚藏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亲友交换而来。例如,早年曾用祖传王冕《仿李晞古山水图轴》与表兄邓懋勋交换刘松年的《四园图轴》。1932年,用越王剑和于晋吾交换《迎音阁诗图卷》。1957年,用石涛《清凉台轴》与徐伯郊交换恽寿平《藕花秋雨轴》。又以八大山人《花鸟册》与徐伯郊易得王冕《仿黄鹤山樵山水卷》。其四,获赠于好友。容庚藏品中有不少是好友赠送的,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刘体智赠送的明代宫廷画家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轴》。黄宾虹、秦仲文、启功、邓尔雅、黄般若、邱石冥、顾颉刚、林直勉、蒋兆和、唐云、谢稚柳、陈佩秋、卢振寰、卢子枢、高承祥、黎雄才、关山月、周怀民、吴灏、吴静山、吴千山、洗得霖等都曾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容庚。

藏家故事

2016艺术品市场八个看点

■ 季涛

回顾2016年内地各家拍卖行的成交业绩,似乎都有不错的成交结果,市场反弹明显比2015年的市场更加明显。

中国嘉德2016年春秋两次大拍总成交额达到44.81亿元收槌,同比2015年两季37.03亿元增长21%;北京保利2016年完成56.8亿元的两季成交额,同比2015年两季61.82亿元减少了8.12%;北京匡时2016年恰逢十年庆,春秋大拍拍出了48.08亿元,同比2015年20.8亿元增长131.15%;北京东正2016年两次大拍拍出了10.2亿元,同比其2015年两季5.81亿元成交增长了75.5%;中贸圣佳两季拍出7.6亿元,同比其2015年6.32亿元大拍成交额增长了20.25%;北京翰海两季成交8.6亿元,同比其2015年春秋12.64亿元成交,减少了31.96%;上海朵云轩2016年大拍成交了2.72亿元,同比2015年两季3.38亿元减少19.53%;上海嘉禾2016年春秋拍出了5.72亿元,同比2015年两季的10.23亿元减少了44.19%;浙江西泠印社2016年春秋拍出了18.98亿元,同比2015年两季的19.4亿元减少了2.16%;广东华艺2016年大拍成交额为10.65亿元,同比2015年两季的9.56亿元增加了11.4%;广东崇正2016年两季成交了6.67亿元,同比2015年6.34亿元成交增加了5.2%。

综合上11家内地较大规模的拍卖企业春秋大拍的成交数据,可以粗略比较出2016年与2015年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差别。11家企业2016年春秋两季季拍总成交额220.83亿元,2015年相应的成交总额为193.33亿元,2016年比2015年增加了14.22%。由此可以判断:2016年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同比2014年稳中有升。

各种数据表明,2015年是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出现调整5年来的最低点,从2016年春季开始,市场缓慢爬出底部的“慢牛”行情似乎已经形成,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古代文物艺术品依然领跑市场。保利的古代书画、中贸圣佳的古籍善本、嘉德的佛像和碑帖拓片专场成交火爆。反映出收藏界对于更高收藏门槛、文化品位和稀缺性上的追求。

二是近现代书画市场回暖明显。尤其是那些精品、“生货”,来源清楚、流传有序,名家收藏过的作品更受欢迎,供不应求,精品与普品价格差距继续拉开。那些有着众多出版、展览、拍卖著录的拍品比起没有著录的拍品明显占有优势,价格要高出一倍到几倍。广东崇正的第四轮“九藤书屋藏名家书画”专场共推出了46件拍品,全部得以成交,总成交额达到5600万元,成交单价比起拍卖场上类似题材尺幅的作品要高出几倍。由此可以看出收藏者对于精品与藏品有序的追求。

三是拍卖场人气普旺,新人办牌量增加。各家拍卖行的一些重要专场,尤其是那些价高品精的夜场拍卖,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成交明显更加活跃,许多专场成交率都在90%以上,100%成交的专场明显增加,形成近几年难得一见的场面。

四是开发新品种、寻找价值洼地。随着一些名家精品、主流藏品的价格不断提升,使得历史上一一些非名品、小众类藏品不断被大家所发现。曾纾的《过访帖》、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卷》、孙君泽的《阁楼山水》、越南星的《草书诗翰卷》都是过去没有被藏家所过多关注的,但经过拍卖行发掘出作品的收藏价值,由于实际存在的稀缺性,因而在拍卖场上得到追捧。西泠拍卖和保利华谊(上海)引入了西洋艺术的拍卖专场,扩大了原来只是由佳士得上海与苏富比北京对于西洋艺术进行的尝试。

五是亿元拍品频现。2016年内地共有8件拍品过亿元。春季拍卖中有曾巩的《局事帖》、傅抱石《云中君与大司命》和蒋廷锡《百种牡丹谱》册页3件;秋拍中又有张大千《巨然晴峰图》、齐白石《咫尺天涯——辛未山水册》、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吴镇《山窗听雨图》和张大千《瑞士雪山》5件。这是2011年以来没有过的情况,说明市场上不缺钱,缺的是好拍品。

六是收藏家进场扫货。据了解,王中军买走了《局事帖》,以充实其在建的美术馆,新疆广汇买到了《云中君与大司命》,龙美术馆买到了《百种牡丹谱》和康有为的大对联,《五王醉归图卷》被苏宁集团买走,以组建充实他们的苏宁博物馆;宝龙集团拍走了《咫尺天涯——辛未山水册》和《瑞士雪山》、《山窗听雨图》被宏图三胞集团购藏。内地大企业集团积极进场扫货顶级的文物艺术品,给市场的未来带来更多的阳光,但也表明,未来高端拍品货源会更加紧张。

七是政府对拍卖业的监管出现松绑的同时,也更加严密细化。文化部于2016年初发布了新修订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2016年3月15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办法》将网络艺术品、鉴定评估等纳入监管范围,放下了审批事项,简化了审批程序和压缩了行政审批时限,对拍卖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规范与程序要求;同年底,国家文物局颁布并实施了《文物拍卖管理办法》,明确了文物拍卖管理的范围、文物拍卖经营许可审批的条件和程序、文物拍卖管理的审核备案的要求、国家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方法、文物拍卖企业及专业人员信用信息记录等内容。同时,不再区分一、二、三类文物拍卖经营范围,不再对互联网文物拍卖资质进行专门审批。反映出文物拍卖管理上的放权与细化。

八是拍卖企业经营更加两极分化。大型拍卖企业继续跨区域经营。保利拍卖与华谊兄弟创投和天辰时代合作进军上海并进行了首场拍卖;北京匡时登陆香港并于2016年11月底举办了第一次拍卖会。而2016年内地中小拍卖行拍卖场次继续萎缩至谷底,拍卖市场集中度在未来将进一步提高,似乎已经没有了悬念。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